



澳门丛书

XiFang AoMen ShiLiao XuanCui

西方澳门史料 选萃 (15—16世纪)

◎ 金国平 / 编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澳门丛书

XiFang AoMen ShiLiao XuanCui

西方澳门史料 选萃 (15—16世纪)

◎金国平 / 编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澳门史料选萃 (15~16 世纪) / 金国平编
译.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11

(澳门丛书)

ISBN 7-218-05124-3

I. 西… II. 金… III. 澳门—地方史—史料—
15~16 世纪 IV. K29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8362 号

责任编辑	赵殿红 韦 羽
封面设计	方楚涓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厂址: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1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5124-3/K·1005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99710(直销) 83790667 83780104(分销)】

序

吴志良

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从明代中叶开埠以来，澳门迅速发展成为南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城市，既是古老中华帝国向外看世界的一扇窗口，也是西方进入中华大地的一座桥梁，在中外经贸、文化交流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若从更高的角度审视，从时代发展的潮流反观，澳门历史在明、清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特区，特别是作为既在中华帝国政治、行政和法律秩序之内，又因为葡萄牙人入居而享有一定内部管理自治权的特殊城市，与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十分独特，其建制也与众不同。鸦片战争后，虽然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推行殖民政策，但中国只是丧失了治权而始终未失去主权，澳门一直以来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并未产生本质上的变化。换言之，有清一代，澳门既在中华体制之内，又在体制之外，只是有时与体制的关系密切些，有时松散些，但跟母体的联系从未割断，中葡在澳门的力量此消彼长，但一直都保持着某种平衡。对澳门史进行较为客观全面的梳理，将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史某些问题的重新认识，使历史的延续性得以更加充分的体现。

因此，在研究澳门史时，我们必须关注澳门地位的独特性，并且扩展视域，力求达到澳门史观、中国史观、欧洲史观及全球史观的融合。换言之，将澳门历史置于中国、葡萄牙乃至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既要充分体现澳





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要紧贴中国历史演变的时代大背景，将澳门与中央政府、两广政府、广州海防同知、香山县丞的政治、行政、法律、经济、军事等层面的关系梳理清楚，充分反映中国对澳门的主权行使和治权管理，科学、客观地确定其在帝国体制之内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这段时期的国际局势，不能忽视葡萄牙和其他西方国家（如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以及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对澳门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忽视中外交流、交锋对澳门社会以及通过澳门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应充分反映在这一时期澳门受到葡萄牙外来殖民统治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理性、准确地描述其从体制之外所发挥的作用，充分反映出澳门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地位，探索澳门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及其对东西方文明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澳门历史研究应充分显示澳门在中外政治与文化冲突、妥协和融合的过程以及由此铸造出来的宽容、和谐的人文景观和社会品质，揭示出不同文化在澳门和平共处、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经验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澳门历史研究才能与中国历史保持紧密的有机联系，同时又能勾勒出澳门历史演变的特有脉络，反映出澳门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共性与个性。

总而言之，澳门历史研究不应只停留于对某些具体史实的搜集、考订和阐述，而需在此一基础上联系近现代中国、世界历史的进程，深入揭示中葡两国之间及其所代表的东西文化间的多层次的交融，尤其是澳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使得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内容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

自从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澳门历史的演变就独具特色。一方面，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澳门历史是一部中国地方史；另一方面，由于葡萄牙人社群在天



朝的土地上建立了具有相当自治权的内部管理机构 and 体制，澳门历史的演变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地方史又有显著不同。澳门历史发展的这一独特性，不可避免地在澳门历史研究上有所反映。

事实上，澳门历史研究是在中葡两国关于澳门主权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发展起来的。中国历代政府一直认为澳门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对其丧失主权，而葡萄牙在某些历史时期则坚持澳门是明朝皇帝赐给他们的土地，他们拥有澳门的主权和治权；在中国传统史学界看来，澳门历史就是一部地方志，而葡萄牙人则认为澳门史是葡萄牙殖民帝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澳门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某种意义上，澳门史观在相当长时间里，特别是18世纪末以来，就受中葡有关澳门主权归属的争论所左右，澳门历史研究也多围绕着此一政治目的而展开。

澳门历史研究的上述独特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澳门历史研究的视野，甚至影响了对澳门档案史料全面科学的收集、整理和客观分析，扭曲了对澳门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在不同时期有关澳门主权的几次争论中，中国和西方史学界、尤其是中葡史学界都按照各自既定的政治立场和需要来使用、解释史料，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研究成果，例如黄培坤的《澳门界务争持考》、张天泽的《中葡早期通商史》、张维华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传注释》、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戴裔煊的《关于澳门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和《明史·佛郎机传笺正》；法兰萨（Bento da França）的《澳门史补遗》、《澳门：社会生活及习俗》和《澳门居民及其同帝汶之关系》、庇礼喇（Marques Pereira）的《澳门中国海关》、《苦力贸易》和《澳门大事记》、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的《历史上的澳门》、科龙班（Eudore de Colomban）的《澳门史概要》、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澳门及其教区》、《澳门地名》、《澳门医学》、《澳门军人》、《16世纪澳门》、《17世纪澳门》及《18世纪澳门》、林安当（António da Silva Rego）的《葡萄牙在澳门的影响》、白乐嘉（J. M. Braga）的《西方开拓者及其发现澳门》和《1513年登陆中国——欧维治抵华》、戈麦斯



(Artur Levy Gomes) 的《澳门史略(1511—1849年)》、高美士(Luis Gonzaga Gomes)的《澳门历史大事记》等,以及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英国人博克塞(C. R. Boxer)的《文献及插图中17世纪的澳门》、《葡萄牙绅士在远东——1550—1770年澳门历史事实与逸闻》和《亚马港的大帆船》以及科兹(Austin Coates)的《澳门记事》和《英国人与澳门》等著作,虽然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也挖掘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局限,论据和论点均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虽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参考,可也为后来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因此,要恢复澳门历史的原貌,要尽可能正确和客观地了解和认识澳门历史的真相,就必须拨开迷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所幸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中葡史学界具备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来进行更为理性、科学、实事求是的澳门史研究,中葡两国、特别是澳门的一些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全面投入澳门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翻译工作,并出版了数十部共数万页极具史学价值的中葡文史料集:

1. 《澳门专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995年,汉语文献影印本,4卷,2704页。

2. 罗理路(Rui Loureiro):《澳门寻根》,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无出版日期,汉语,146页。

3. 萨安东主编,金国平等汉译:《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6—2000年,10卷。葡中双语,4683页。

4. 洛瑞罗(Rui Loureiro):《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文献选集》,载于《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1期,1997年,汉语,199页。

5. 古靖仪、古维杰(Cecília Jorge e Rogério Beltrão Coelho):《澳门游记:外国作者的评论、描述和纪录》,澳门政府、东方文萃出版社,1997—1999年,2卷,葡、英、法等多语,800页。

6. 何大化 (António de Gouvea) 著, 阿拉乌热 (Horácio P. Araújo) 编注:《中国年报》, 澳门、里斯本: 东方葡萄牙学会、葡萄牙国立图书馆, 1998 年, 葡语, 1 卷, 488 页。
7. 黄鸿钊主编:《中葡澳门交涉史料》, 澳门基金会, 1998 年, 2 卷, 汉语, 773 页。
8. 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澳门基金会, 1998 年, 1 卷, 汉语, 390 页。
9. 安文哲 (António Aresta)、何思灵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议事会——澳门议事会史料集》, 澳门市政厅, 1998 年, 1 卷, 葡语, 437 页。
10.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澳门问题史料集》, 1998 年, 汉语, 已刊书籍影印本, 2 卷, 1381 页。
11.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澳门基金会, 1999 年, 2 卷, 汉语, 981 页, 70 件文献影印本。有葡语提要。
12. 戈斯达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编:《澳门学院年报 (1594—1627)》, 葡萄牙大发现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 1999 年, 葡语, 1 卷, 283 页。
13. 杨继波、吴志良、邓开颂总主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6 卷, 汉语, 4716 页。
14. 邢永福主编:《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 浙江, 华宝斋书社, 1999 年, 5 卷, 汉语文献影印本, 1088 页。
- 15.《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 北京: 档案出版社, 澳门基金会赞助, 1999 年, 1 卷, 汉语, 397 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2 卷, 汉语, 2277 页。
17. 吴志良编:《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 金国平葡译, 澳门基金会, 2000 年, 中葡双语文献影印本, 1 卷, 汉语 349 页, 葡语 28 页。



18. 萨安东、金国平：《晚清名臣奏议澳门》，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2000年，葡语（汉语文献葡译），223页。

19. 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2000年，《文献注释篇》，汉语，132页。

20. 金国平、吴志良编注：《粤澳公牍录存》，澳门基金会，2000年，8卷，葡语，3500页。

21. 普塔克（Roderich Ptak）主编：《中葡文献（*Sinica Lusitanica*）》，里斯本：东方基金会，中葡英三语文献影印本，2000年，第1卷，168页；2003年，第2卷，170页。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东方基金会赞助，2000年，2卷，汉语文献影印本，940页。

23. 萨安东辑、金国平汉译：《葡萄牙及耶稣会参与中国礼仪之争及康熙皇帝与教廷关系研究及文献集》，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2001年，葡语，3卷，1382页。

24. 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萃》，广州：花城出版社，澳门基金会赞助，2001年，1卷，汉语，663页。

25.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基金会，2002年，汉语，654页。

26. 邹爱莲、吴小新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中心编辑：《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汉语文献影印本，4卷，1913页。

27. 《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河南：大象出版社，2003年，汉语，283页。

28. 黄鸿钊编：《澳门史料拾遗：〈香山旬报〉资料选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3年，1卷，汉语，295页。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门理工学院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中华书局，5册，2004年，汉语文献影印本，1024页。

还要指出的是，澳门文化司署在1996—1999年出版了多部



散见于葡萄牙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档案目录,对了解澳门原始档案的收藏情况非常有用。此外,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5年结集再版了《蜜蜂华报》(葡语,1卷,294页);澳门基金会、教育暨青年局1995年再版了《大西洋国》(葡语,3卷,2244页);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再版了《知新报》(汉语,2卷,2088页);澳门基金会1998年再版了《新生》(葡语,6卷,3136页);澳门官印局1998年再版了《澳门档案》(葡语,4卷,1385页);澳门基金会2000年再版了《杂俎》(葡语,6卷,3387页)。

档案史料是正确认识与解读澳门历史事实的可靠途径。在大量的原始档案和资料的基础上,中葡学者在澳门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如澳门开埠原因、葡人社区内部自治的性质、主权和治权的归属、殖民统治方式和实质等)的分歧已经有所缩小,并在某些立场和观点上逐渐趋同,甚至达成新的共识,澳门历史研究也由此走出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争论的狭隘范围快速向纵深发展。

首先,从近年来面世的研究成果来看,澳门历史研究也正逐步从单一的通史性的宏观研究扩展到专题性的微观研究,从描述性研究走向分析性探讨,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城市发展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新成果。例如,全汉升的《明代中叶以后澳门的海外贸易》、林子升的《16至18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和《澳门: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黄文宽的《澳门史钩沉》、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谭志强的《澳门主权问题始末》、吴志良的《澳门政制》和《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章文钦的《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和《澳门诗词笺注》(4册)、刘羨冰的《澳门教育史》、普塔克(Roderich Ptak)的《葡萄牙在中国》、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的《16至19世纪澳门至马尼拉的商业航线》、《殊途同归》和《18世纪澳门海事生活》、黎沙(Almerindo Lessa)的《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和《澳门——热带葡萄牙人类学札记》、阿马罗(Ana Maria Amaro)的《从草棚到混凝土大厦——澳门是这样诞生的》及

西方澳门史料选萃

大量论文、施白蒂 (Beatriz Basto da Silva) 的《澳门编年史》(5卷) 和《苦力移民: 1851—1894 年澳门卷宗》、贾渊 (João de Pina Cabral) 和陆凌棱 (Nelson Lourenço) 的《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洛瑞罗 (Rui Manuel Loureiro) 的《贵族、传教士与官员——16 世纪葡中关系》、《广州葡囚信》、《澳门寻根》和《澳门历史指南 (1500—1900)》、迪亚斯 (Alfredo Gomes Dias) 的《澳门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过渡的信号: 19 世纪的澳门》、李志高 (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 的《中葡与澳门问题》、孔塞尚 (Lourenço Maria de Conceição) 的《澳门在葡萄牙与中国的两个条约之间》、萨安东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的《圣塔伦子爵关于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备忘录》、《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和《中葡关系研究》(与金国平合作); 萧伟华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的《澳门宪法史初探》、叶士朋 (António Manuel Hespanha) 的《澳门法制史概论》、格德斯 (João Guedes) 的《宪政实验室》、阿尔维斯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 的《两个帝国之间的港口: 澳门与中葡关系研究》、席尔瓦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的《澳门向现代过渡: 1841—1853 年亚马勒及葡萄牙主权的建立》、瓦雷 (António Vale) 的《十字架与龙: 18 世纪在华葡萄牙保教会》、阿尔维斯 (José Augusto dos Santos Alves) 的《澳门公众舆论: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澳门报刊》、吉马良斯 (Ângela Guimarães) 的《一种特殊的关系: 澳门与中葡关系 (1780—1844 年)》以及东方基金会集合众多葡萄牙历史专家撰写的洋洋巨著《葡萄牙在远东史》(6 卷) 等等。

其次, 澳门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性明显加强, 并且由于中外档案资料的综合运用和勘比, 研究范围和领域有所拓展, 研究水平明显提高, 特别是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论点, 纠正了许多一直存在的讹误, 而且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也有所创新, 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除《澳门研究》、《文化杂志》、《行政杂志》、《澳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的大量文章外, 近年单行新出版的有李向玉的《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汤开建的《明清士大夫与澳门》和《澳门开埠初



期史研究》、金国平的《中葡关系史地考证》和《西力东渐》、金国平、吴志良合作出版的《镜海飘渺》、《东西望洋》和《过十字门》等专题论文集，运用大量的东西方文献，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了细致的考证，或补充论据，或修正观点。而汤开建最近的一部澳门史新著《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更是一部以新发现的中西文史料进行互证的全新研究成果。

其三，由于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特别是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加入，澳门历史研究队伍出现了一批新生力量，本土研究者也明显增加。这一批生力军，不仅年富力强，还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理论基础和外语水平，他们的研究已初见成果，其中包括娄胜华的《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查灿长的《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赵利峰的《晚清粤澳闹姓研究》、董少新的《西洋传教士在华早期行医事迹考述》、王东峰的《清朝前期广东政府对澳门管理》、夏泉的《明清时期粤港澳教会教育研究》、何永靖的《澳门早期议事会研究（1583—1850）》、彭蕙的《明清时期澳门黑人问题研究》、李长森的《澳门土生族群研究》、崔维孝的《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严忠明的《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澳门早期城市发展史研究》、卜奇文的《清代澳门与广州经济互动问题研究（1644—1911）》、杨开荆的《澳门特色文献资源研究》、李燕的《港澳与珠江三角洲文化空间关系和文化传播研究》、李淑仪的《16—20世纪澳门葡语文学的探索与研究》、彭海铃的《汪兆镛与近代粤港澳文化》、张廷茂的《16—18世纪中期澳门海上贸易研究》等等，难以尽举。

在西方、特别是葡萄牙语学术界，也有不少新人崭露头角，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例如许国辉的《澳门与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历史分析：政府干预、葡英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博士论文，1998年）、皮纳（Isabel Alexandra Muta Pina）的《耶稣会南京住院：起始至恢复（1599—1633）》（硕士论文，1999年）、费雷拉（Patrícia Drumond Borges Ferreira）的《17世纪葡英华南关系史》（硕士论文，1999年）、卡尔莫（Maria



Helena do Carmo) 的《18 世纪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硕士论文, 2000 年)、塞阿布拉 (Isabel Leonor de Seabra) 的《18—19 世纪澳门与暹罗的关系》(硕士论文, 2000 年)、佩纳尔瓦 (Elsa Filomena Macedo de Lima da Cruz Penalva) 的《耶稣会在澳门 (1615—1626)》(硕士论文, 2000 年)、奥尔塔 (Ana Maria do Rosario Rei Silva Horta) 的《葡萄牙社会记忆中的澳门》(硕士论文, 2000 年)、帕伊瓦 (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 的《共存中的同异: 澳门社会中译员之作用》(硕士论文, 2000 年)、阿拉乌热 (Maria Carla Faria Araújo) 的《葡萄牙法与土著居民: 澳门 (1846—1927)》(硕士论文, 2000 年)、雷凯思 (Cathryn Hope Clayton) 的《如果我们没有差异, 我们将不再存在: 澳门过渡期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博士论文, 2001 年)、日谅 (Alfredo Gomes Dias) 的《葡萄牙、澳门及鸦片问题的国际化 (1909—1925)》(硕士论文, 2002 年)、内托 (Oswaldo da Veiga Jardim Neto) 的《军乐团和市政乐团在营造澳门音乐生活中的角色》(博士论文, 2002 年)、科雷亚 (Sérgio de Almeida Correia) 的《澳门政治阶层 (1986—1999)》(硕士论文, 2002 年)、史密斯 (Provost-Smith, Patrick) 的《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与马德里: 耶稣会关于在华传教的争议 (1580—1600)》(博士论文, 2002 年)、张增信的《从马拉巴至澳门: 16 世纪在华葡萄牙人》(博士论文, 2002 年)、奥利维拉 (Francisco M. Roque de Oliveira) 的《欧洲对华知识的构建: 约 1500 年至约 1630 年向欧洲知识界介绍了中华世界的刊本及手稿》(博士论文, 2003 年)、孟德斯 (Carmen Isabel de Oliveira Amado Mendes) 的《葡萄牙与澳门问题的解决 (1984—1999): 国际谈判中的实用主义》(博士论文, 2004 年) 及费尔南德斯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的《中国与澳门: 澳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其对中葡关系中的影响》(博士论文, 2004 年)。此外, 还有数部博士论文在准备中, 包括罗利得 (Rui Lourido) 的《16 世纪之澳门》、皮纳 (Isabel Alexandra Muta Pina) 的《16 至 18 世纪耶稣会差会的本土助手》、科雷亚 (Pedro Lage Correia) 的《范礼安在东方的传教 (1574—1606)》、席尔瓦 (Teresa Lopes

da Silva)的《澳门的苦力贸易》及普加(Rogério Puga)的《英国文学中的澳门》。

可以预见,澳门历史研究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加纵深的长足发展,研究水平也会有快速的提高,研究内容也会更加深入,展现出一派新气象。我们认为,无论在学术环境和史观还是在史料文献基础和研究队伍方面,现在已经具备编写一部专题性澳门史的基本条件。澳门基金会计划约请国内外澳门史有关专家、组织最强大研究力量,综合内地、澳门、国外特别是葡萄牙学者分别在澳门史方面的学术积累和科研优势,撰写一部反映最新观点和史料、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澳门史新编》,同时编纂一部新的澳门编年史。

三

值得指出的是,澳门史大多数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对事实的考证和论述的层次,还未能上升到思想和理论的高度,深度挖掘澳门历史意义和价值的学术自觉性还不够,研究的视野在相当程度上也局限于中葡关系史框架之内,没有进一步发掘澳门历史在中国、葡萄牙甚至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格局之中应有的重要意义;其次,澳门内部社会历史的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对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几乎是个盲点,现有研究成果也比较缺乏本土视角;再次,在澳门历史研究中,古代与近代澳门史研究成果颇丰,但现当代澳门史研究不够,成果比较少;又次,由于澳门历史研究的误区还不少,学者间对某些问题的争论和分歧依然很大,充分理性讨论的学术氛围也尚待形成,有限的研究力量需要更好的整合,研究网络需要进一步完善,深度研究需要更加有效的分工合作。此外,由于中葡澳门史资料和文献的互译还不多,使得中葡史学界的沟通以及对彼此的研究成果了解不够充分,既造成中葡学者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继续存有分歧,也导致大量工作的重复进行,减缓了澳门史研究的长足进展。更加需要指出的是,澳门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没有在整个史学界引起足够关注,有关



成果没有得到与其重要性相称的传播与推广，而这一点，对于提高澳门历史文化城市的地位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澳门历史的档案史料整理工作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由于收藏地比较分散，挖掘潜力依然很大。再者，本地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史料还比较缺乏，有诸多中外文史料、特别是报刊资料亟待收集和翻译，很多中外文史料也需要认真勘比；澳门历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中葡学者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且各自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澳门历史研究的误区也较多，需要进一步考证、去讹。例如澳门主权问题，尽管葡方史学界基本上对中国主权不再有异议，但整个争议的起因及过程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在双重管治这个问题上，需要从中国制度内的法律渊源上去考察。葡人以为，中方任命了理事官为中方代表，实际上，该职不过是一个便于沟通的技术职务，并不具备中方给与的管治权，但澳门葡人将其视为一个重要政治、外交、行政职务。中国允许下的澳门内部自治也有中国制度的渊源。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所以，中国基层权力基本属于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由此可见，明清政府实际上是把居澳葡人作为一种中国领土上的外来“臣民”，允许他们在县级之下由“洋绅”为首进行自治。换言之，中国官府利用他们协治理“番夷”，从而给予他们有限的自治权利。在这种情境中，澳门的“委黎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理事官（procurador）”。虽然理事官集澳门外人社团的政治、外交、行政权力于一身，但其一切运作的可控性或合法性完全由中方决定。对中方来说，是零成本的管理方法，却可收到有效管治之益，不失为一种既有承袭、又有创新的极佳制度安排。又如对亚马勒（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的评价，也存在争议。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中葡双方的评价呈现巨大反差：在中方看来，他是殖民主义的代表，严重破坏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和治权的行使。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葡方将其尊为民族英雄，赞扬他使澳门摆脱了中国的羁绊。我们认为，不同的民族利益导致了不同的评价是自然的，也是可以

理解的。在这一点上，几乎不可能得到“共识”，但从史学的角度，仍然必要勘比中葡史料，回溯事件发生的背景，进一步探讨其起因及过程，特别是在亚马勒被刺案上，中葡历来的立场南辕北辙：在中方看来，沈志亮是为民除害的民族英雄，中国官方并无参与其事；可在葡方看来，沈志亮是被买通的杀手，两广官员是主使。不久前披露的清代澳门望厦赵氏家族族谱表明，在亚马勒被刺前，澳门乡绅赵封石与当时的两广总督有过接触：“二十七世封石公，诨勋……贞固足以干事，明哲又能保身。西洋夷酋哑吗叻，肆恶横行，毁关掘墓。公挺身递稟督宪徐公广缙，驻轿面谈约一时之久，后暗约义士沈志亮、郭泰安梟哑吗叻之首，以泄天朝之愤怒，而申地府之冤。”此外，在1887年条约的评价上，赫德（Robert Hart）及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作用及1887年条约本身的性质仍然有待澄清；而有关澳门界址纠纷的争议，更加应该以原始资料及实际情况为依据，作一全面公正的历史剖析，特别是从中国土地制度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葡人租居、租据澳门的法律地位。在“五·二九”工人运动和“一二·三”事件上，史学界的分歧更大，其间有待理清的情节还很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此，如果要使澳门历史研究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澳门历史学界首先应该加强团结和合作，继续广泛地收集中外档案史料，对外文资料进行必要的翻译工作，并与中文史料加以勘比，为澳门史研究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文献基础。其次，需要进行学理上的爬梳，确立研究路径，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特别要展开多学科整合研究，可以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同时借鉴和运用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的先进研究方法，以求更大的突破。再次，需要宏观与微观结合，共性与个性并重，把澳门历史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宏观视角下考察，突出澳门与中央政府的制度关系以及和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强调澳门在中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同时，结合葡萄牙和世界历史的进程进行探讨，不忽略葡萄牙对澳门历史的巨大影响，准确定位葡萄牙在澳门居留管理的性质。最后，也是目前最为重要的，我们要花大力气，



投入澳门内部社会发展的研究，理清澳门内部社会的结构和变化，说明澳门社会包容和谐的内在特性及其给异质文化如何共处可能带来的启示。

概而言之，澳门历史研究的总体方向应该是充分参照和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最新史料、最新成果，加强本土视角，既注意澳门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共同性、一致性，又把握住澳门历史的差异性、特殊性，重视对澳门内部社会各个领域的探索并作出更多必要的微观个案和专题研究，深入探讨澳门历史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和价值。只有这样，澳门历史研究才能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历史研究才能避免因袭陈说，才会有所创新、有所提高；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终写出一部比较真实纪录世代澳门居民集体记忆、反映其生活历程的历史，而这一部澳门历史，不仅属于澳门，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四

在这个意义上，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件值得我们庆幸的事情。金国平先生甘于寂寞，十多年来潜心专注于故纸堆里，利用常居葡萄牙和精通中葡双语的优势，将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许多连葡人都不爱看的原始资料进行细心的检索、研究、整理、翻译和注释，再比照中文史料加以考证，近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他的累累硕果，不仅澄清了不少多年来因档案资料不尽不实或使用不当而令澳门史学者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方便了中文研究者，令我们不必再转引或转述近现代西方史学者著作中有关澳门早期历史的原始材料，减少以讹传讹的错误。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研究令葡萄牙史学者汗颜：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许多本国的资料竟是由一位中国学者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所做的研究更加显得非比寻常，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

金国平君是我上大学时的葡语老师，又是我的挚友和合作